

朱德发文集

朱德发 著

第十卷

古今文学通论

五四文学初探
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
中国五四文学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
五四文学新论
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
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
朱德发序评集
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
古今文学通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朱德发文集

第十卷

古今文学通论

朱德发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德发文集:全10册 / 朱德发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209-07570-1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朱德发—文集 IV. ①I-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4326 号

责任编辑: 李怀德

朱德发文集(第十卷)

朱德发 著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 × 239mm)

印 张 24.5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7570-1

定 价 498.00 元(共十卷)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调换。(0539) 2925888



目 录

古今文学通论

通识篇

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沉思	002
以科学态度对待中国文化或文学传统	019
维新变法:中国文学转换的现代性特征及其规律	033
原创齐鲁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考析与蠡测	046
古今文学在审美现代性上的互通点	060
齐鲁文化的人学结构与“五四”周作人的人本思想	075
中西非理性思维在现代文学中的交汇与对接	093
科学方法论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107
现代作家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诚”与“爱”	127
革命文学群己对立英雄观新解	146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突围与探索	152

评论篇

穿越荒原 走向春天	
——新时期情爱文学综述(1976-1985)	164
蓦然回首 悲泪交流	
——苦难型情爱文学的抽样考察	189



历尽磨难 痴心不改

——奉献型情爱文学例析及文化意蕴剖视 202

双重追求 奋进搏击

——“改革加恋爱”文学模式评述 216

强化主体 走向现代

——独立自强型情爱文学的文化阐释 229

寸草之心 芳满天涯

——张弦爱情小说的独特世界 244

生命骚动 心灵超越

——张贤亮小说情爱模型解构 257

按照“美的规律”构建小说艺术王国

——读《郭澄清短篇小说选》有感 271

论王蒙文学研究的发现逻辑机制 283

“十七年”:郭沫若对现代诗学的建树

——读《郭沫若书信集》(下)有所思 292

“里比多”释放的悲歌和欢歌

——细读莫言《丰乳肥臀》有所思 306

齐鲁儿女的英雄悲歌

——观《闯关东》有感 319

开拓电视剧红色历史叙事的新天地

——观《南下》有感 323

赏析篇

《社戏》的情节构思 330

清新俊逸的《绿》 334

诗情画意的《雪》 339

《梁生宝买稻种》塑造人物的艺术特色 344

《暴风骤雨》片段“分马” 349

太阳的光辉照进了沉睡的果树园

——析《果树园闹腾起来了》 354



“寻求诗的意境”	
——《秋风萧瑟》赏析·····	362
《风筝》的主题与诗意·····	368
《祝福》的审美价值·····	374
附件一：朱德发小传·····	379
附件二：朱德发公开出版著作编目·····	381
附件三：朱德发其人其作被评述文章编目·····	383



通
识
篇



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沉思

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对此笔者虽有探索但始终有所困惑或深不下去。带着诸多问题,对于如何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作了些思考:首先应弄清“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不能仅仅以儒佛道文化取代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则是个多元复杂的系统结构,这是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其次应选取新的视角切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深层关系,笔者认为古代文学既是传统文化通向现代文学的艺术桥梁也是播扬传统文化的良性媒介,故必须透过古代文学研究来理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从精神层面考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内涵的趋同性诚然重要,但是从主体思维方式的角度深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探究却是抓住了根本的根本。

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虽然并不是新话题,对它的关注一直贯穿于新文学现代化的全过程;但是越深入地勘探下去,却越感到这个话题的深不可测,玄奥难解,常释常新又言不中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撰写《中国五四文学史》时,笔者就开始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问题,到眼下为止着重从这样一些角度或层面对其进行了研究:从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三个逻辑层次,即明季、晚清、五四三个历史阶段,史论结合地阐述了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演化的轨迹及其内在机制,旨在说明现代文学并非“西化”的产物,它与传统文化(文学)一脉相承,虽不是全盘承传却是有选择的继承^[1];从现代性与民族性相互变奏规律的角度,探讨传统文化(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的互动关系,揭示出百年中国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始终遵循着现代性与民族性相互变奏的规律,现代性与民族性变奏得均衡和谐新文学就兴旺昌盛,两者变奏得杂乱无章新文学就出现曲折^[2];从“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的相互促进的视野,纵向性地观照古今文学的数千年演进历程,发现中国文学从古到今至少经历了五个“文的自觉”时代,



即先秦诸子百家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明代中后期、五四时代、新时期,这五个时代在文化上的突出特征则是“人的自觉”开启了“文的自觉”,推动了中国文学的转换和发展^[3];以辩证思维从多维度考察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既指明形态与内涵的转型直至审美风格的转型,都没割断与传统文化(文学)的联系,又指出文言文、传统文体仍在现代中国文学多元形态中占有一席之地^[4];以齐鲁文化为切入口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政治模式或隐或显地穿越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宏大叙事中,那些革命文学或战争文学甚至改革文学或官场文学等都有所体现^[5];通过重读原创文论,认真琢磨,细心推敲,重新认识到五四文学革命并没有“彻底反传统”,五四创建的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文学)作了有选择地自觉地继承,既没有全面否定传统又没有与传统彻底决裂,那种“彻底反传统论”或曰“与传统断裂论”,是缺乏充分根据的,也许是一种断章取义或抓住一点无限上纲的误读^[6]。笔者虽然对“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作了上述的探讨,并参阅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总感觉还有不少问题困惑着我,其中较为有难度的问题是:究竟如何理解传统文化,到底传统文化(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从哪些部位或方面发生了转换性的对接,作为创作主体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发生对接过程中是何种思维方式起了主导作用?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有人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就是儒家文化,这有什么玄妙值得讨论的”。即使传统文化只限定于儒家文化也是个值得深究的课题,且不论古代对儒家文化的见仁见智,就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的“弘扬民族文化”,这近百年对儒家文化的评说就翻了个大筋斗,即从所谓“绝对否定”到“绝对肯定”。在认识上反差如此之大,直接牵涉到对现代文学与儒家文化关系的价值评判,即五四时期应该否定的传统难道在当下的文化语境都应该肯定吗?像这样文化价值观的颠倒,关系到现代文学评价的大问题,不值得认真研究吗?况且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能与儒家文化画等号,儒家文化只不过是传统文化总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它包含在传统文化之中,却不能与传统文化平起平坐,更不能代表或取代传统文化;因此仅仅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定格于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文化与现代文学的研究,这至少在认识上是



个误区。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一般是指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生成的现代文化相对应的整个古代文化而言,不光是封建时代的文化,远古以来的所有文化形态都应囊括在内。不过文化有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之分,若是从文化与文学的疏密程度来考察,那精神文化与文学关系更紧密,这不仅因为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文学本身就是极为耀目的审美文化,如同我们研究先秦文化就必须解读书先秦文学一样,胡适就是因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才熟悉了古代文学并产生改良中国文学的动议;所以从深入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这角度来考虑,要研究的主要不是物质层面的传统文化而重点乃是精神层次的传统文。只有将传统精神文化及其载体古代文学研究透彻,才有可能真正梳理和阐述清楚传统文化精神及其物化审美形态与现代文学从内涵到形式,究竟发生了哪些深微的对接或转换。当然,这并非说物质层面的传统文化不应该了解,不过在笔者看来,首要是研究精神层面的传统文化,其次熟悉物质层面的传统文化,这不仅因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是个紧密联结的整体,物质文化附丽着或蕴含着体现着精神文化,而且精神文化也能转化为物质力量,不断创造着丰富着更新着物质文化;文学作品的人化自然、人文环境的描绘、各种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隐喻、象征手法的运用等等,构成的有质感的物化形态,无不体现或显示出这种文化精神或那种文化精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传统文化的精神层面或物质层面甚至两者的关系都要认真探究深入体察,然而相比较而言精神层面的传统文化考析应置于首位,这是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疏与密、近与远的程度和距离决定的。比如若从精神层面研究道家文化与李白浪漫诗歌的关系,可以直接与现代文学郭沫若浪漫诗歌进行对应的贯通研究,足见从精神层面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比其物质层面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

以系统论考之,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多元复杂的结构系统。仅就思想精神层面的文化形态来说,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文化是个源远流长的功能强大的子系统,作为“仁”学即人学的孔子核心思想,影响并规范了一代代中国各层次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心理结构、思想境界甚至行为模式,或者说孔子的“仁”学的有意或无意地传播沾染已变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存有丰富的意蕴也在现代文学中留下深微的印痕。但是必须看到“仁”作为思想概念并非孔子的独创发明,早在《论语》之前的诸多典籍如《诗经》、《国语》、《左传》中就出现了;孔子的创造性贡献在于继承了在以往“仁”的“相亲相爱”本意的基础上,不仅充实与深化了它作为一个道德概念的内涵,而





且把“仁”升华到具有普适价值的最高指导意义的哲学范畴。这是一种“仁者爱人”、“泛爱众”(《学而》)即由尊己爱人直至爱广大人类的人道主义哲学,“它超越等级‘泛爱众’,超越民族‘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7]。这种富有博爱精神的人道主义进入现代中国之后虽被多次扫荡,但是它的不朽思想活力,依然是古今文学贯通的潜隐灵魂。较长时间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认识的局限,对孔子创建的以“仁”学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文化思想体系的人道主义思想研究不足,肯定不够,甚至将其与现代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这种偏差与失误如果不纠正克服,很难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因为原创儒学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内涵,既吻合“文学是人学”的本质又能为现代文学创造提供思想资源,只有对儒家文化系统最富有永恒价值和超越意义的人学思想探索深研究透,才能进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堂奥。但是任何文化系统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所蕴含的思想意识并非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儒家文化系统也是这样。绝不像古今一些迷孔崇儒者所吹捧的那样玄乎其玄、神乎其神,甚至把它抬到吓人的高度;即使儒学创始人孔子的语录也不是句句皆真理,虽然五四文化先驱们的“批孔”有过激之处,但是有的批评还是切中要害之弊的。现下有的人试图完全否定五四“批孔”的意义而为“儒家文化”翻案,并积极鼓吹“尊孔读经”,某些学校让新生一入学就穿上清代的官服叩拜孔子,更有甚者教学生怀着盲目崇拜的心理如同“文革”早请示晚汇报那样在孔子像前诵读《论语》;试问,这种做法与中国人 21 世纪所处的现代化全球化的文化生态环境协调吗?这能说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吗?在学术上欲深化儒家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不仅应对孔子的原创儒学进行重新解读或利弊透析,而且也要从流变中洞悉和把握儒家文化系统。儒学虽然在秦朝遭到“焚书坑儒”灾殃,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思想不仅为历代帝王所青睐,甚至将其作为统治思想的重要根据和资源,而且每朝每代的儒生们都将它奉为经典进行注释、解读和研究,宋明新儒学派就是在继承中发展并创建了理学,即使满清统治者也把儒学尊为“经典”。不论帝王将相或者儒者文人,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全盘承传孔孟创建的儒家文化思想,无不从现实的政治需要、思想需要、道德需要或文化需要、学术需求出发,有选择地有鉴别地有创造地有补充地来运用和发展儒家文化思想,始终使儒家文化系统处在动态过程中;正是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原创儒家文化的消极因素或许受到重用得到畸形发展,使原创的积极因素受到压抑得到消解,或许原创儒学的积极因素



受到重视得到弘扬光大,使原创的消极因素受到抑制得到遮蔽。但是从历代帝王的统治实践来看,施仁政者少,大多以等级森严、惨无人道的专制主义取代了原创儒家文化思想的带有博爱性质的人道主义。而晚清至五四所创建的现代文学主旨正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弘扬人道主义;这从儒家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来看,现代文学所否定的是儒家文化变异的专制主义,所肯定的则是儒家文化固有的人道主义,正是后者与西方人道主义的对接与契合凝成了新文学的现代人道主义灵魂。

如果说儒家文化系统是中国传统文化总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那么与它构成三位一体结构的还有佛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两个子系统。儒佛道虽然三位一体,相互联系紧密,通常将它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来理解和把握;但是儒佛道毕竟各有各的文化内涵规定,各有各的系统质,因此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总系统的子系统,佛家文化也是其子系统,道家文化当然是其子系统。究竟儒佛道三个子系统之间是何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倒是值得认真探赜发微的;不过本文的宗旨并非研究儒佛道文化的详细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这里只能略论之。要是把儒家文化归于理性主义范畴不算标新立异的话,那么将道家佛家文化划入非理性主义范畴也是说得通的;诚然儒道文化都是土生土长的,是地道的生于中土、长于中土、传于中土的本土文化,且有“儒道互补”之说,表明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离不开的文化精神,同时儒道文化皆以人为本,具有同质的人文精神,但是儒家文化体现的却是执着于现实的入世的人文精神,而道家文化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则是带有出世的超越性。老子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欲要克服人的本质异化,就必须超越这足以异化人性的苦难现实而“返璞归真”,使人性复归便是道家救民救世的理想设计。试想道家文化这种满怀爱意之心的人道精神与儒家的“仁者爱人”的人道情怀所取得的一致性,同现代中国文学中流露出的人文精神是否可以遥相贯通?佛家文化是从印度传来的域外文化,在中国有既深且广的影响,它在传播过程中与儒道文化也形成相反相成互补互促的关系,虽然佛教文化系统较为复杂,精华与糟粕杂糅,但本质上也是一种人本文化。即佛家的“成佛”与儒家的“为仁”、道家的“得道”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有所不同,然而“实质上都是从人的运动变化出发体察人,又回到促成入朝着理想的目标运动变化”;“佛家,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禅宗来看,其‘成佛’同道家‘得道’相似,也是基于人可以从现实的蒙蔽和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转变而提出趋同理想的转变。佛不在人的身外,而就在人心中。正是





据此,禅宗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8]这说明佛家文化系统的禅宗经过儒家、道化的改造完全中国化了,佛已不在“彼岸”、“来世”,而在人的自身,可以立地成佛,“不假外求”了,正如六祖慧能所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就使佛教文化、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凭借以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联通起来,成为儒佛道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从而也形成中国传统文化总系统中同中有异的三个显著的文化子系统。在我看来,只要把儒佛道文化系统蕴含的人文精神充分地发掘出来并给出务实求真的阐释,才能有足够证据破解五四新文化是“彻底反传统”的不实之词,也可以有力地回击新儒学派借五四“反传统”为口实来否定新文化新文学应该且必须反的“传统”的历史价值,更有助于探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深层关系。

我国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步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这个共同体中虽然儒佛道文化对各民族文化都有或深或浅的影响,但它毕竟是汉族的主流文化,而很多少数民族于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生存与发展中也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系统,它们应是中国传统文化总系统不可或缺的子系统,因此亦是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颇为重要的维度。这不仅因为少数民族文化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建设,即使儒佛道文化也是渗入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因素,即少数民族文化汲取不少儒佛道文化的成分;更因为在较长时间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中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化这个维度,甚至没有把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有机部分来对待,故而只有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方能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探讨有新的充实与开拓。例如,伊斯兰文化约在唐高宗时期就从陆路和海路传入中国,虽然它不像佛教那样传播得快,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但是它却以宗教文化固有色散落在偏远的民间,至少我国少数民族中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等信奉伊斯兰教;特别是伊斯兰文化之于回族,既是一种宗教文化更是一种民族文化,“若从中华民族文化史的角度来讲,回族既凭借着操汉语且‘大分散’的先天优势,始终置身于各民族文化之林,沉浮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以开放、主动的姿态汲取着除伊斯兰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的滋养。同时又因‘小聚居’而执着、持久地葆有伊斯兰文化于生活的方方面面”。^[9]伊斯兰文化如同佛教文化一样都来自异域,却在历史长河的传播中与其他文化系统相互冲撞与交融、相互制衡与补充,既丰富了自身又保持其文化个性,并对现代中国文学中“人性”母题的纵深开掘与文学体式探索创新产生了独特而深



远的影响。如果忽略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部分的伊斯兰文化的研究,那就很难从文化的视角对于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现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出合情合理的阐释。如沙陆墟、霍达、张承志等著名的回族作家,只有理解了伊斯兰文化才有可能理解其现代文学创作与传统文化的真实而深切的关系。再如,居住于我国东北北方地区的满、蒙古、鄂伦春、鄂温克、锡伯、达斡尔、朝鲜等各少数民族深受萨满教文化的影响,其萨满舞蹈以特定的艺术方式形象地记录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童年的时代心灵与感情的发展轨迹,既反映了他们与自然斗争的意志力量又展示了他们的迷惘失误也表达了他们对理想的追求^[10]。自南北朝以来,入主中原建北魏的鲜卑族,建辽的契丹族,建金的女真族,建元的蒙古族,建清的满族,都是源自东北地区的世居民族,这五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国约八百年;因此东北地区萨满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构成部分对整个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若是对萨满文化缺乏认知那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深层底蕴、特别是那些生于东北长于东北创作于东北的作家作品的独特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是揭示不出来的。从“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现代国家视野来看,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极其丰富复杂,理所当然地是中国传统文化总系统里的异彩纷呈的子系统,上述仅是少数民族崇尚的伊斯兰文化和萨满教文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充满深邃感神秘感的藏佛文化只能再叙了。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博大精深,如果只把儒佛道作为传统文化来把握,那不仅不能全面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而且无形中舍弃了不少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既不利于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全方位传承又不利于有中国特色现代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与少数民族文化系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间文化,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总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系统。它同中国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从形式到内容,民间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具有相当多的同质同构性。所谓民间文化是相对于官方文化即国家政权严密控制的主流文化而言的一种带有发散性、自由性、宽松性和驳杂性特征的文化。它并没有严密的体系性、强固的独立性和严格的规范性,只要是国家政权主导思想统治薄弱或统治不到的地区或群落都有可能产生民间文化;它与官方文化并不完全是异质相对的,官方文化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容许它的存在,但绝对不能使其异质因素与主流文化对抗,即合谋是可以的对抗是不行的。这就导致民间文化的内涵良莠并存瑕瑜互见,若沉淀于人类的文化心理既有优化人性利于人性健全发展的可能性又有异化人性不利





于人性向善向美的可能性;然而毕竟民间文化是宽松自由的,对于现代中国人本文学的建构与人性母题的表现终究是利大于弊的。在中国传统文化总体结构中的民间文化系统可以从多维度给以审视:一是处于“天高皇帝远”的广大乡村(包括市井),由于统治思想波及不到或统治不严,易于民间文化包括风俗习惯的生成与流传。侠文化就是有一定的民间性,“儒家文化的正统性地位的日益巩固,一方面使得侠文化隐身于江湖市井之中,以反正统的形态在民间社会求得自我发展,虽然不再有大规模的侠客义士出现,但侠文化所内蕴的侠义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积淀却获得了更广泛的存在领域;另一方面,由于侠文化其本身个性特征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或无定型性,因而既不像儒家文化那样矜持于正统满足于自我‘完善’,也不似佛、道文化那样类似于宗教文化那样清高自许,而是在持守‘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语出唐人李德裕的《豪侠论》)的终极信念和拯世济难的基本文化功能前提下任‘意’采纳,仗‘义’兼容,使侠文化越来越具有儒家式的伦理化倾向和道家、佛家般的理想化、神秘化色彩,这实际上正好符合侠文化的那种适性自恣狂放不羁的精神气质。”^[11]这种侠文化精神不仅凝聚或散布于城乡民间文化群落,而且承载于古代游侠型诗文和演义传奇文本之中,也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通俗武侠小说和革命战争文学的创作。二是有些少数民族文化生成于或传播于边远的山区、森林、荒漠、高原,与国家政权的主流文化保持相当的距离性和独立性,自由的选择也自由的延展,而这样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态也可以理解为民间文化。“伊斯兰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民间文化:它长期散落、沉淀在穆斯林聚居的偏远地区,时隐时现地渗透于汉文化之中,始终高擎心灵自由的人性大旗,以宗教文化的形态进入穆斯林的生活空间与精神空间,以强大的包容力和瑕瑜互见的野性美而为广大的底层民众信奉并恪守。”^[12]不理解伊斯兰文化这种民间性就难以正确理解传统文化的渗透与影响给现代中国文学带来的复杂艺术风貌。三是有些地域文化从特定的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民间文化,这不仅因为特定的地域远离官方文化的直接统辖与干预,而且特定的地理条件、自然环境、文化传统、风俗习性、方言土语等因素也能促使民间文化的形成。常说的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晋文化、吴越文化等,虽是地域文化但也可以视为民间文化。例如吴越文化在战国时期或晋隋时期也许是一种官方文化,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它却成了地域性的民间文化,其主要特质是既有艰苦卓绝的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韧性战斗、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和卧薪尝胆不忘国耻的崇高民族气节,



又有积极取进、勇于开拓的自由开放精神，也有莫不重乐、酷爱自然、崇尚婉约美与阳刚美的美学精神。这种埋藏于文化深层结构的吴越民间文化精神铸造了一代代吴越人的性格气质，也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建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不只培育了鲁迅、茅盾这样的现代文学巨匠，也养育了郁达夫、叶圣陶、丰之恺、朱自清、艾青、徐志摩、戴望舒等现代文学大家，可见不探究民间文化也难以深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的勘察。除了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总系统中不可忽略的两个子系统外，还有人化的山水文化、草原文化、海洋文化以及酒文化、茶文化、烟文化、饮食文化、服装文化等，都与审美文学的营造密切相关，鲁迅曾以酒、药文化的角度颇有创意地探讨了魏晋文学，足见酒、药文化之于文学创构的重要性；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研究传统文化绝对不能忽略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探析，而民族文化心理的理性层次或非理性层次乃至集体无意识层次，无不是传统文化长期积淀和合力塑造的结果，不论是崇拜英雄心理、酷爱和平心理或者是忠于祖国心理、向往善美心理甚至那种盲目顺从的奴性心理，等等，都有深刻的文化思想根源。作为以塑造人类灵魂或民族灵魂或个人灵魂为己任的现代中国文学最容易接受吸纳由民族文化心理或民族性格或民族记忆递送来的传统文化各种信息；因此深入剖析传统文化塑造的各民族文化心理或民族性格或民族行为亦是全方位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的不可舍弃的维度。

上述对中国传统文化以系统论视野进行了不厌其烦地考察，旨在阐明传统文化是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多元系统；唯有对其全面梳理、解读和掌握，方有可能论析清楚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的错综关系，才能使那种现代文学是建立在“彻底反传统”基点上的论调得以消解，及其以“彻底反传统”为借口完全否定五四文学革命批判儒学中非人思想因素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用心不能得逞。

二

作为精神层面的中国传统文化多以文学艺术为载体，丰赡充盈灿烂辉煌的古典文学艺术是储藏传统文化的宝库。传统文化铸造了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承载了传统文化，虽然文学艺术是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但文学艺术却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即它是审美文化，而作为审美文化的古典文学艺术又是分门别





类的,至少包涵文学、美术、音乐、书法、雕塑等;不过我这里只想略述文学,说明传统文化在语言艺术的古典文学中的蕴藏量既丰富又深邃,取之不尽,学之不竭,它是通晓或获取传统文化信息久读不厌、耐人寻味的经典文本。先秦诸子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但在思想文化史上却是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墨侠文化等的一座思想丰碑,一篇篇诸子散文中所蕴含的是儒家、道家、墨家等的原创思想或元文化形态;经过一代代学者文人的注解阐释和发掘梳理,不仅使诸子学说有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系统或思想体系,而且也使先秦散文成了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因此要想真正感受、体悟、认知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必须重读先秦散文,或选其经典名篇反复解读反复体味,或系统地阅读,将其散文一篇不漏地重读重解。历代学者文人的注释考证或研读心得固然需要参考与汲取,然而更重要的是应以现代知识分子的阅读期待、阅读眼光、阅读体验和阅读理解,去重新解读重新把握散文内涵。或许在重新解读过程中能发现一些尚未发现的新文化新思想新智慧因素,或许在重新解读中匡正一些从来认为是正确的误读甚至被歪曲被诋毁的思想文化,或许在重新解读中洞见了古今文化互通的永恒思想和超越性真理。例如重读《论语》就会感悟到“仁者,爱人”和“泛爱众”的人道主义思想与现代博爱人道主义思想是相通的;重读《孟子》就会感到儒学的民本思想与现代的人本思想也有联通点;重读《墨子》就会感悟到墨家的“兼爱”和“交相利”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的仁义理想与现代提倡的平等观念和相互帮助思想亦有相通点。要真正感悟传统文化精神,不只是必须重读重解先秦诸子散文,更要重读重解历代的文学精品,这不仅因为传统文化思想经过创作主体审美处理后转化为文学作品的主导灵魂或诗性哲理,也因为被诗化了的传统文化精神既能从感情上打动人又能从理性上启迪人,这样能使重新解读文学作品所感悟到的传统文化精神较之先秦理性散文要深切得多丰盈得多。重读屈原《离骚》既能感受到楚文化那种驾着鸾凤凰鸟乘风上天寻帝倾诉和“上下求索”的浪漫精神与探索勇气,又能体验到儒家的忧国忧民的强烈深沉的忧患意识及其对君王愚忠的虚妄;重读陶渊明的田园诗既能感受到道家文化的隐逸思想对其影响之深又能体验到儒家文化“穷则独善其身”原则对其影响之切;重读李白诗歌,既能感受到老庄文化思想的滋养使其达到古典浪漫主义顶峰,又能体验到儒家的“安社稷”、“济苍生”的政治理想与道家愤世嫉俗的精神以及游侠文化中反抗强暴、救弱扶倾的精神完全糅合于诗意诗情之中;重读杜甫的诗篇,不论“三

